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中国国民党 在台改造研究 (1950-1952)

Zhongguo Guomindang
Zaitai Gaizao Yanjiu

冯琳 著

凤凰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中国国民党

在台改造研究

(1950—1952)

Zhongguo Guomindang

Zaitai Gaizao Yanjiu

冯琳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 / 冯琳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5506-1895-4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台湾省—1950—1952 IV. ①D675.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508号

书 名 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
著 者 冯 琳
责 任 编 辑 陈晓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6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895-4
定 价 62.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5725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佳木

副主任委员：茅家琦 陈孔立 张海鹏

委员：（依姓氏笔画）

王建朗 邓孔昭 孙亚夫 朱佳木 许世铨

张海鹏 杨天石 杨匡汉 何仲山 汪朝光

陈孔立 陈祖武 茅家琦 郝时远 姜小青

陶文钊 徐博东

主编：张海鹏

副主编：陶文钊 王建朗 汪朝光

执行编辑：李细珠 杜继东 陈晓清

总序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仍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加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台湾历史研究、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百多年来台湾人民的苦难、奋斗和牺牲,对于理解台湾人民,进一步认识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离的关系的重要性,促进台湾史研究的学术繁荣,将有所裨益。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9 月成立,意在推动、组织台湾史的学术研究,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对台湾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发展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国外学者的合作,推动台湾史学科的建设,为祖国统一和学术进步服务。台湾史研究中心成立伊始,我们就设想为台湾史研究建设一个发表成果的园地。鉴于研究台湾历史的学者队伍状况,建立专业的台湾历史学术刊物的条件尚不够成熟。我们改变主张,决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努力推动台湾史研究,展示台湾史研究成果,使它成为为台湾史研究服务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是一个公开的学术园地。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台湾史研究的成果,以及其他学者所撰写的台湾史专著,愿意交由本丛刊发表者,经本丛刊委托的三名资深专家审定,认为达到出版水平者,本丛刊愿意刊载,公诸同好。本丛刊推出的研究成果,以专著为主,亦包括少量国外研究台湾史的译作。遴选纳入丛刊的著译,力求视点独到、资料翔实、方法科学、论证严密,学术上具有开拓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为本丛刊组织编辑委员会,组成编辑部,并委托专人负责编务。纳入丛刊作品的体例、观点等,皆由作者文责自负。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凤凰出版社担任出版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非赢利、非实体的学术社团,我们将一以贯之倡导、推动台湾历史的研究。我们缺乏经费支持,谨在此呼吁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提供出版资金,欢迎国内外各界赞助,以共襄台湾史学科繁荣之盛举。

张海鹏

2013 年 9 月

绪 论

选题动因

1949年,中国国民党遭遇了大失败,丢失了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区,被迫退至台湾岛,凭借台湾海峡天险和美国的保护,而逃过了灭亡命运。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台湾因《马关条约》之故,一直在日本殖民者的手中,直到1945年始得光复。光复后又因国民政府不当的接收和管理政策等原因,台湾爆发了影响至今的“二二八事件”,对国民党在台统治打击甚大。在1949年退迁台湾之时,国民党并未在台湾建立稳固的统治体系和权力网络。加上台湾民族、语言、地形等情况均与大陆不同,情况复杂,国民党面临严峻考验。大陆时期,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的党治能力并不强。党政机构迁至台湾后,国民党在生死存亡关头何去何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在1940年代后期即在热议的改造问题,到此时似乎成为不得不为之的唯一选择。

1950年7月26日,改造的中枢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组成,此后至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推动了一场全面的党务革新。可以说,1950年代初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是该党几十年历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其在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整顿队伍、重塑新生的里程碑。在从大陆溃败后转踞台湾而又连续维持执政党地位约40年的过程中,改造运动是决定性的一环。这次改造与1924年的改组堪称中国国民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次党内改革,是蒋介石经过沉痛地反思之后,排除阻力、亲自主导的过渡性运动。在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蒋介石时而以“总统”身份、时而以总裁身份、时而兼具两种身份出现,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的改造效果在台湾得以实现,原本发自党务的改造扩展到政经、社会、文化各方面,对台湾造成多重影响。在面积约占到全岛三分之二却几乎没有党组织的山地,在县市党部招牌高挂、公文乱飞却没有什么组织运作的广大下层,与其说是“改造”党务、“改造”组织不如说是“创建”党务、“创建”组织。以“七全大会”为标志,两年多的改造时期结束。经过内部改造及其带动的四大改造、全民总动员,加上美国的庇护和援助、土地改革、地方自治等释放压力与对抗情绪的有益举措,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此次改造运动直接关系到中国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的统治,意义匪浅。

然而,与其研究价值之巨极不协调的是,大陆学界对此一重要事件尚缺乏

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与两岸隔阂、资料难以取得有直接关系。台湾地区、美国虽在1980年代末就有研究专著和博士论文出现,但必须承认,以往的研究成果都有各自的局限。譬如,不少成果偏重于中国国民党官方文件的引录,论点基本是单纯的歌功颂德,没有发掘更多资料,亦未揭示改造运动中的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立场及方法的不同,大陆学界单靠学术交流看到这些已有成果是远远不够的,无法了解改造运动的全貌。以往研究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对改造运动的真实效果揭示得少。这个真实效果不能直接从国民党的报告中获知,必须再找寻更多底层的资料,看到更多参与者的所思所想、经历讲述,并找到更多的统计数据等一手资料,加以分析、对比,去伪存真。况且,新的一手资料在不断开放中。至为重要者,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原件。蒋介石日记的开放每年都有新的推进,1945年至1955年的部分在2008年首度公开。这是以往研究无法获得、而又不能缺少的研究资料。面对课题意义匪浅而研究状况大有余地的现状,面对新资料陆续开放的机遇,我选择了1950年—1952年的中国国民党改造作为研究课题。

前人的探索

关于中国国民党在1950年—1952年改造的研究,除有关该党史研究、台湾史研究的著述中有所论及外,相关度较高的著作主要有: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1950—1952)——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印行);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蔡玲(Linda Chao)、马若孟(Ramon H. Myers)著,罗珞珈译:《中国第一个民主体系》(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版)。论文类如: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迁台前后的改造与创新》(一九四九——一九五二),《近代中国》第87期);Tsang, Steve(曾锐生), *Revitalising the Revolution: Chiang Kai-shek's Approach to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1950s*(《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Bruce J. Dickson, The Lessons of Defea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n Taiwan, 1950—1952(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3, Mar. 1993);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 A New Kind of Party: The Kuomintang of 1949—1952(《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四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等。学位论文类如: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1950—1952)——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1985年硕士论文);陈晓慧:《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改造之研究(1950—1952)》(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年博士论文);王良卿:《动荡中的改革:中国

国民党从“革新”走向“改造”(1945—1950)》(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3 年博士论文)。

台湾地区对 1950 年代初中国国民党改造的现有研究,对中国国民党官方档案的利用方面值得肯定。如政治大学陈晓慧的博士论文,就较多利用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会议纪录及台湾方面已有成果,指出中央改造委员会所担负的“主要是传达一种革命的意志精神的传承,将党内领导阶层决定的各种政策及限制,藉由执政党的优势力量由上而下传到基层单位,影响所及乃是全国上下了解‘革命’的使命”^①。陈晓慧的博士论文是台湾地区改造运动研究的后期作品,可谓是近十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代表。前期研究则以秦孝仪的学生许福明为代表,他是台湾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国民党改造运动者。在许福明的研究中,改造的主要工作、重大成就及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其论述的重点,政策、理想介绍较多,基调是褒扬式的。较后期研究而言,前期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郁,批评性有限。当然,台湾地区许多政治史、中国国民党史的知名学者,如陈三井^②、吕芳上^③等,均陆续发表过相关论文,提出他们对此重大事件的见解,共同推进该课题的研究。王良卿则对走向改造的过程研究颇有心得。这些研究成果将台湾地区关于中国国民党改造的研究推到一定高度,但也不是说没有局限性。台湾方面的研究大多根据中国国民党改造时期的会议纪录、各类文件,对改造政策、措施和目标进行正面评述,改造实际进展情况和效果则受到普遍的忽略。且限于立场、政治环境等因素,台湾方面的研究往往跳不出他们的圈子,看不到一些问题更深层的东西。

西方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早期的研究,习惯以自由主义的观点审视中国国民党的改造,多强调外在因素(美国援助等)的助力,忽略内在改革的研究。1995 年,英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曾锐生在《重整革命:一九五〇年代蒋中正先生所倡导的政治改革》中,将视角放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进行探讨,代表了西方对改造运动研究的一个新思路和新方向。该文强调蒋介石对改造的作用,指出改革方针都是蒋制定,蒋是改革的舵手和原动力。离开蒋介石的领导,则很难设想改造能够成功。尽管以蒋介石对革命成功的定义看,直到他去世,革命也没有成功,但他毕竟在台湾奠定了基础,使蒋经国在 1986 年能成功推行民主化。

^① 陈晓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改造之研究(1950—1952)》,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200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29 页。

^② 陈三井:《中国国民党“民国三十九年”之改造与台湾新政》,《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五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59—593 页。

^③ 吕芳上:《痛定思痛:战后中国国民党改造的酝酿(一九四七—一九五〇)》,《近代中国》第 136 期,第 1—32 页。

此后不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蔡玲(Linda Chao)与马若孟(Ramon H. Myers)的《中国第一个民主体系》问世。该书描述的是台湾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其中改造时期有20多页的篇幅。虽然篇幅不长，难以深入，但该书以西方人的超然立场提出一些新奇的结论，如他们认为“革新后的国民党是个政治帮会式的党”，而蒋介石成为“帮会老大”；改造后的20年，中国国民党由排他性的党蜕变为包容性的党，由精英党蜕变为群众的党，形成“制约式政治核心”^①。蔡玲与马若孟没有对改造运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仅根据有限资料指出改造后的国民党是一个面目全新的政党。并且因意识形态之故，该书偏重于对国民党在台湾推行民主化的美化。从为民主化奠基的角度，对中国国民党改造的价值加以充分肯定和赞许，是近15年来西方研究大体沿用的思路和模式。

2006年底，松田康博出版的《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可被视为日本方面改造运动研究的代表作。当然，从题目可知改造运动也不是松田在该书中唯一的研究对象。他从改造运动谈起，论述了中央一级的党政关系、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土地改革等方面，从诸多方面论证中国国民党在台一党独裁体制的确立。在党治类型方面，该书指出中国国民党经改造运动确立的党治类型是“领袖独裁型党治”^②。该书作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任职，对台湾政治洞察很深，其著作亦多体现了对党国体制、政治运作的倾斜。该书在其2001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集多年研究成果于其中，颇有心得。惟因该书立意宏大，偏重于上层，偏重于政治，关于改造运动的各项措施及其运作的情况，着墨不多，改造运动中更细微、更贴近民间、贴近底层的内容不易找见。

相对而言，大陆关于改造运动的研究现状最为薄弱。已有成果甚少，且一般都是短浅的小篇幅文章，仅对改造运动进行泛泛介绍和转述性评价，所引用的资料亦极为有限。除有关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著作对改造运动进行了简略介绍外，相关论文有：孙尧奎：《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原因与动机》（《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年第5期）；高学军：《试析国民党在台湾的党务改造运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张黎宏：《国民党改造刍议》，（《台湾研究》2000年第3期）；李松林：《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党务改造运动》，（《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1期）等。学位论文有：刘霞：《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改造与

^① 蔡玲(Linda Chao)、马若孟(Ramon H. Myers)著，罗珞珈译：《中国第一个民主体系》(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40—41页、第56页。

^② 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

2000 年下台后的改造之比较》(首都师范大学 2003 年硕士论文)等。大陆已有的研究普遍呈现出由于资料不易获取而无法深入的情形。

研究视角和方法

笔者认为,在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两岸来往日益密切的今天,对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尤其是退台初期这场改造运动的历史,有深入推进研究的必要。台湾地区和海外的研究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都有一定偏重和忽略,普遍为他们所忽略的研究角度是:对在台湾实施改造的特殊条件与环境及所受到影响何如的研究;对改造运动在下层运作真实情况的研究;对参与改造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干部应对态度和心理的研究;对改造工作的局限及产生效用究竟多大的研究;对改造中重要变化的来由及其作用的研究等。而这些将成为本文论述的重点。当然,为构成一部专著,改造的内容亦不得不加以介绍。因这部分所用核心原始档案是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纪录、报告文件等,与前人使用的差不多,不可避免地会与以往研究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本文的重点,本人的创新点不在改造工作内容的描述上。

关于研究方法,笔者主要采用以下几种:

一、实证研究。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近十年,此间受益最深的应该是这里严谨的治学风气。实证研究是近代史所素有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是治学的一大特色。史学实证性极强,令人信服的研究是在充分占有和准确解读大量资料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清理和精辟入微的考证,再经过理论分析和升华得来的。本书拟遵循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努力做到一切以经检验的史料为出发点和依据,言之有据,不主观臆断,不盲目推理,以史料支撑论点。

二、开拓史源。在台湾地区和海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史源的开拓是论著成功的关键。现有成果的一个通病是史源雷同、单一,在主要依赖中央改造文件和会议资料的前提下,难免出现学术研究的变相重复。本人在搜集资料时已注意到此点,想方设法另辟蹊径。在寻找前人已用的资料之外,留意搜寻前人未用到的有关资料。

三、借鉴社会史研究方法,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在适当的地方运用社会史方法和视角透视政治现象。虽然二战后到 1949 年 10 月之前台湾亦是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但相对于大陆的广大地区而言,台湾只能算是一个次要的行政区域。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重心不在台湾,其“党治”力度也很少能辐射到台湾。加上 50 年日据时期“皇民化”教育等措施的影响、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族群的繁杂等,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国民党要通过两年的全面改造奠定在台统治基础,进而谋求“反共抗俄”,

其措施必然要考虑到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人文背景。例如要改善具有一定数量、生活最为贫苦、关涉巩固台湾基地的渔民生活,争取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等。因此,将这段改造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历史放到台湾具体的背景中去考察,视野兼顾中央与地方、平地山地与离岛、外省党员与台籍党员,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

四、关注计量史学方法,尽量多掌握统计数据。不但尽可能在中国国民党的工作报告、内部资料和党刊中去找,还尽量找寻其他有关统计类资料,试图从中发现线索。计量方法确实能帮助笔者了解改造实况,做出合适定位,而不是人云亦云,乱发空谈。但其中也有难点。比如有些统计数据有错误,在不同的两处资料中所给数据不同,甚至在同一资料的不同地方所给数据都有不同。有时是统计者笔误;有时是党务人员为充实或夸大成绩,有意造假;有时则是统计方法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笔者会千方百计搜寻旁证,做出判断。但当寻找旁证而不得时,就只能尽量利用已有资料做出分析和推敲,从中加以取舍。这亦体现出找寻历史真实的困难性:当时的人所做统计不精确,他们依据这些数据做出的定位和评价是有偏差的,这为后人的研究带来更多困扰。

总之,相对于此前学者们的研究来说,本书可能更倾向于微观,与以往纯政治与大历史层面的宏论有别。

目 录

总序	(001)
绪论	(001)
选题动因	(001)
前人的探索	(002)
研究视角和方法	(005)
第一章 国民党的痼疾与改造前的反省	(001)
第一节 积重难返的顽症	(001)
第二节 全党上下的反思	(005)
第二章 走向改造	(012)
第一节 退台前改革党务的尝试与探讨	(012)
第二节 蒋介石主导的走向改造之路	(018)
第三节 两个重要事件	(026)
第四节 在台改造的条件	(030)
第三章 改陋为简、重起炉灶——智囊与权力核心的组成	(041)
第一节 酝酿阶段的总裁办公室	(041)
第二节 组建中央改造委员会	(046)
第四章 党务挂帅的全方位改造	(054)
第一节 党员的整理	(054)
第二节 组织的建立与加强	(067)
第三节 扩充社会基础、争取民众	(074)
一、向下发展、发动民众	(074)
二、社会调查	(082)

三、为民服务、为民除害	(091)
第四节 干部分子与党员的训练	(096)
第五节 宣传的加强	(110)
第六节 以党养党	(119)
第七节 政策与理论研究	(126)
第八节 运动的扩大	(130)
第九节 国民党“七大”	(135)
第五章 改造的三大贡献	(141)
第一节 “蒋家党”的确立与中央权力的加强	(141)
第二节 党政关系的调整	(145)
第三节 制度的建立	(148)
第六章 改造有限解决了哪些问题	(158)
第一节 因改造而有改善的部分	(158)
一、派系问题	(158)
二、组织状况	(163)
三、党员质量	(167)
第二节 为何叫有限解决	(169)
一、派系问题死而不僵	(169)
二、基层组织仍不健全	(172)
三、党员质量改善有限	(173)
第七章 改造未能解决的问题	(181)
第一节 作风大半依然故我	(181)
第二节 消极心理复杂多样	(185)
第三节 工作效果诸多遗憾	(191)
第四节 小组工作有名无实	(194)
第五节 社会基础一仍其旧	(203)
一、民众与国民党的距离未能缩小	(204)
二、“群众路线”走了多远	(209)
第六节 特殊地区与群体关注不够	(215)

第八章 几项新举措之述评	(220)
第一节 党务工作重返军队和学校	(220)
一、军队政治工作与党务的改制与重建——蒋经国势力的伸展	(220)
二、学校党务的恢复	(226)
第二节 县级以下组织秘密	(233)
第三节 基层划编办法	(236)
第四节 社会调查——兼论与特务工作的异同	(244)
一、社会调查的效果	(244)
二、与特务工作的异同	(252)
第九章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综合评论	(256)
第一节 治党及执政体制分析	(256)
第二节 社会构成特征	(262)
第三节 蒋介石与改造运动	(268)
第四节 对改造运动的基本认识	(275)
参考文献	(290)
附录	(304)

第一章 国民党的痼疾与改造前的反省

第一节 积重难返的顽症

中国国民党^①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若加上它的前身——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在大陆存在了近50年,其中执政长达22年。如果再往前追溯,其前身还可追溯到1894年的反清团体兴中会。在这几十年的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几经浮沉,由一个仅二十余人组成的反清秘密团体,成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力量,继而打垮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并高举民族旗帜,与中国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赶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其党魁几度在国际场合与美、英、苏首脑同列为四大强国领袖。然而,最为辉煌的年代竟也是它最为腐朽的年代,在共产党的攻势下,短短几年,这个专政多年的国民党集团被迫撤退海岛,令人唏嘘。

国民党之所以能在抗战胜利后四年的时间里,从声望正隆的执政党地位迅速沦落到走投无路的境地,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其积重难返的内在弊病。

由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的早期历史上,组织散漫、纪律松弛、党员成分复杂与凝聚力缺乏始终是困扰孙中山的问题。孙中山生前曾认识到“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②。为解决组党中的问题,有效进行革命,孙中山苦心思虑,几度重组新党。但由于他始终未能形成一套完善的建党理念,在艰难的革命形势限制下,这些弊病并未能得到克服。国民党内只有上层组织的低效运作,地方组织形同虚设。党务

^① 中国国民党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此名称延续至今。在一定意义上讲,“国民党”是指1912年8月25日至1914年7月8日之间的称谓。但学术界一般以国民党指代中国国民党,并约定俗成地以国民党指代包括各个前身在内的中国国民党。为求行文简约,本文亦多采用此方法。在特指1912年8月25日至1914年7月8日之间的国民党时,均以注释说明。

^② 孙中山:《复市棠函》(1920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7页。

的瘫软无力使国民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以致不少人只知孙中山不知国民党^①。由于党内缺乏对党员严格的约束机制,到后来,党员与党甚至多年可以不发生任何关系^②。除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其余鱼龙混杂、各怀异心。1919年,中华革命党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之后不久,又诞生了该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军”^③。军人集体入党成为国民党的一个特色。号称百万众的党员,实则并未具备统一的信仰和步调。1924年国共合作时,在孙中山看来,中共不过是些“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④,拒绝有损国民党大党身份的党外合作方式。然而,党内合作后,这个让孙中山不以为然的、建党仅3年、拥有数百人的小党却险些主客易位,有将“容共”演化为“容国”的趋势^⑤,国民党组织运作的薄弱无力显露无遗。

为谋党务振兴,孙中山在几次重组国民党而效果不彰之后,进行了两次整顿。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孙中山组织起草委员会,推行改进计划,制定了总章和党纲。然而,历时几个月的改进,没有将国民党带出困境,其措施不仅不能造就新式政党,且大多流于纸面。在与苏俄的接触中,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俄共组织形式的好处,开始接受鲍罗廷关于效仿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的建议。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改组。但孙中山没有全盘接受苏俄经验,而是摒弃俄共的意识形态,仅借鉴其组织技巧,采取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的改组虽然也有成效,仿照俄共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加强了国民党的动员组织能力,但国民党对意识形态和组织技术的舍与取恰恰是抛弃了列宁式政党最为成功的经验,同时造成了多元性性格与活力缺失的组织形式的矛盾。这一体用特点也注定该党既无法成为西方式民主政党,也无法成为苏俄式政党,其不伦不类的结合从长期来看无疑将变成发展的沉重包袱。

在北伐前夕,反帝反军阀是人心所向,高举这面旗帜的国民党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但这种状况未能维持很久。北伐胜利为国民党带来政治上的辉

^① 吕芳上称民初的国民党为“孙中山党”。参见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1917—192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6月,第308页。

^② 晏益元:《关于小组会议》,《改造》第十七期,1951年5月1日,第58—59页。

^③ 为响应孙中山号召,1921年陈炯明宣布粤军集体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不但许多军官和士兵不具备三民主义信仰,而且这支党军也不效忠于党魁。当孙中山发动北伐进攻江西直系军队时,陈炯明授意部下发动军事政变,导致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

^④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页。

^⑤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1页。

煌,使之成为一统天下的执政党,同时却也带来量的急速扩大和质的继续下滑的问题。在由在野党变为执政党的过程中,大量劣绅土豪、地痞讼棍趁机混入党内,藉以谋得某些权益与仕途便利。蒋介石为丰满其羽翼,广为招降纳叛,使北洋军阀政府中许多的封建军阀、政客也摇身变为党国大员。而与此同步的清党运动,更在清除共产党的同时,将大批党内人才杀害或淘汰,使地方组织陷于瘫痪与分裂状态。

党组织能力的低弱,社会控制力的瘫软,多数党员素质不高,在此时开始引起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党内高层的注意。蒋在清党反共时,对“本党(国民党)政治组织之欠缺”发出感叹^①。胡汉民甚至痛心地写道:“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②蒋介石虽素重军事轻党务,时而亦“以党亡为忧”,意识到“党员散漫,皆为敌党各个击破”,慨叹:“人心堕落,民气衰弱,一至于此,革命云乎哉!”^③但慨叹归慨叹,部分国民党领袖注意到党的问题,却未给予足够重视。党组织的散漫一直延续到大溃败。有党员回忆说自己与党不发生直接联系长达十年:“除了在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我才想到我是党员外,我几乎完全遗忘了党,也完全被党所遗忘……党于我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④党对于党员来说,只是个填写履历表时才想到的一个名词,这样的组织焉能不似大厦将倾?

国民党最初由一群反清的松散结盟发展而来,旧同盟会时期就分孙文、黄兴、宋教仁三派,辛亥革命后,宋氏组阁,竟有二十多人争夺总长职位,五十多人争夺次长职位^⑤。后虽历经更名改组,也没有真正统一过思想,政见和派别分歧历来存在。1920年代后期以降,在蒋介石争夺和巩固党魁地位的过程中,派系斗争不但没有消止,反有越演越烈之势,并公开化。在国民党内部,资深望众者有之,功高震主者亦有之,蒋介石难孚众望,难免产生反对派系。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相继出现,与蒋介石集团分庭抗礼,挑战中央权威。蒋为稳操党国领导权,素来任人唯亲,扶持嫡系,扩充党羽,并善于施展权术,导演派系争斗闹剧,以坐收渔翁之利,无形中对派系倾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的暗中扩张和争夺,也导致国民党内不同代理人和利益集团间的斗争。围绕在精英人物周围形成的胡汉民派、朱家骅派、孙科派、李济深派等,在地方称雄的有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陈济棠派等,各个派系人

^①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2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②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1927年7月1日),《中央半月刊》第2期。

^③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④ 《小组生活一年》,《台湾党务》第十七期,1951年9月16日,第32页。

^⑤ 上海《申报》,1912年10月3日。